

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李健胜

(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关键词] 河西儒学; 吐蕃; 河西地区

[摘要] 河西儒学是以河西地区为中心形成的具有承续两汉经学传统, 提倡兼容并蓄、经世致用, 学术与生存样态颇为灵活、功利的一种地方儒学形态。它肇始于两汉, 形成于魏晋, 曾对统治势力延及河西的吐蕃的政治、教育、伦理观念等产生过一定影响。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既是我国历史上以儒学为纽带的民族文化交流、互融的典型史实, 也是儒学及其文化传统辐射和影响青藏地区的典型实例。

[中图分类号] B2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003(2011)05-0057-09

学术界对河西儒学的研究起步较早, 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一书就曾涉及到河西儒学的相关内容。当代以来, 邵如林先生的《“河西文化”论》^[2]一文, 系统地阐释了“河西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其中也有谈及河西儒学的内容。马志强、吴少珉二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儒学略论》^[3]和张步和先生的《试论五凉的三个儒学中心》^[4]二文, 对五凉时期河西儒学的发展有过详论。有关儒学对吐蕃的影响与作用, 学术界也有过一定的研究。如陈炳应先生的《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5]一文, 以敦煌文献为依据, 探讨了儒学对吐蕃的影响。赵晓星女士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6]一

文, 对敦煌地区的落蕃官有较深入的考察研究。韩锋先生的《儒学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7]一文, 也谈及儒学对吐蕃政治及文化诸层面的影响。韩锋先生的新作《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8]一文, 也谈及儒学传入吐蕃的途径及其影响, 还专门对敦煌文献所见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学因素进行了剖析。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 大多以宏观的角度研究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甚少注意到地方化的儒学形态对吐蕃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也更为具体。魏晋以来, 河西儒学以其独特的学术与生存形态, 不仅对当地割据政权、豪门士族及一般儒生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曾对统治势力延及河西地区的吐蕃产生过一定

[收稿日期] 2011-04-07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学在青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项目批准号: 09CZS029)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健胜(1975—), 土族, 青海贵南人, 副教授, 主要从事先秦史及思想文化史和青藏高原区域历史研究。

影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吐蕃政权在河西地区统治时期任用汉族儒生、翻译儒家经典等史料,以及在任用河西儒生、推行儒学等的相关记述,详尽分析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影响与历史意义。

一 河西儒学的形成与发展

西汉政权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盟,在河西地区自东向西设有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和敦煌郡,并在此地实行移民屯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9]其中,所移之民大多为中原贫民,政府“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岁数,假予产业。”^[10]此外,悖逆之人或弛刑徒也是移民的对象。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在平息太子叛乱后,“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11]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12]此时,河西四郡的在籍人口已达280 211人^[13]。东汉时期,徙入河西地区的汉族人主要是军屯士卒和弛刑徒之人,他们世居此地,承担着边防、屯田等义务,经年历久,成为当地的汉人土著。为满足为数众多的移民及其子孙的文化教育需求,这一地区的儒学教育当时已开始萌起。

两汉时期的学校教育分太学、郡学和私学三个层次,东汉时,郡学和私学都得以长足发展,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反映了当时地方教育的盛况。又按《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志五》:“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郡守除负责地方行政、司法等事务外,还须承担推举人才的义务,自然也有举办郡学、督导三老等基层官员推行教化之义务。尽管缺乏相关史料,但不难想见,这一地区的儒学教育早在两汉时期已形成,并有所发展。

东汉以来,河西地区兴起一批世家大族。如敦煌地区有名的索氏家族,《敦煌世族志残卷》伯2625号载“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钜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鸣开都尉索骏复西。[迁]敦煌,骏在东,居巨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长幼,咸累代为官。”至西晋时,索靖、索琳等人在当地政权任要职,其中,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汜衷、张昶、索紞、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14]。此外,河西段氏也“世为西土著姓”^[15]。这些儒生借助自身能力、家族力量及时代机遇,在魏晋时期形成一个声名远播中原、势力延及五凉及北魏的士人集团。

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到任后,张轨平定了鲜卑叛乱,“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16]张轨祖籍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家世孝廉,以儒学显。”^[17]在巩固了河湟局势后,张轨“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8]大力推行儒学教育。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士人避祸河西。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张轨

“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19] 时任冯翊(今陕西大荔县)太守的江琼,也“弃官西投张轨”,其“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20] 这些避居河西的移民大多来自洛阳西北及关中地区,且为数不少^[21],而这些新近到来的汉族移民和一些中原学士也为张轨推行的儒学教育提供了人口基础,史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22],“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23]。晋室南渡后,张轨之后在河西陇右之地建立了前凉政权,中原士人多避居此地,张氏礼而用之,史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24]

大批中原人士的到来,使得河西之地学术文化大兴,金城人赵柔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25] “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牧百缗,柔呼主还之。”^[26] 赵柔曾为陇西王源贺的《祗洹精舍图偈》作注,“咸得理衷,为当时儒僧所钦味焉。”^[27] 可见,赵柔结合河西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及多种学术思想共存并蓄的现状,不仅对儒学以外的释、道之学颇有见解,还试图融通各家之长以滋补儒学。事实上,赵柔的学术风格并不是个案,前述出自河西巨姓的儒生大多也有类似的学术倾向。

此外,西凉的建立者李暠也是位“通涉经史,尤善文义”^[28]的硕儒,其政权以敦煌为首府,也曾大力推行儒学,后凉、北凉、南凉等政权大多致力于推行儒学教育。正是在这些具有汉文化背景或受汉文化影响的地方政权、世家大族及来自中原地区儒生群体的助推下,河西儒学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29]。与此同时,河西儒学接续了两汉儒学经世致

用之传统,侧重于功利性的追求,试图在政权更迭频繁的时代里以儒家学术振兴家族、实现自我。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安定张氏、陇西李氏、西平田氏、敦煌索氏等家族涌现出一批“以儒学显”、“经学致位”的儒士。如河西硕儒刘昺曾师承著名经学家郭荷,被世人奉为硕儒,西凉李泽命其为儒林祭酒,专管注记,沮渠牧犍尊其为国师。北魏时,他又被封为乐平王从事中郎之职。此外,敦煌索氏家族成员索袭等人十分谙熟阴阳五行之术和讖纬之学,并籍此参与时政。总之,“河西儒学能够得到发展还在于儒学本身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儒家学说的入世精神。”^[30]

河西儒生不仅以经学干政,同时还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步形成豪门势力,把持了河西地区乃至河湟带的地方行政权力,就连由鲜卑族秃发部建立的南凉政权,都要极力拉拢河西士人。据《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记述“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儒;阴训、郭幸,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嵩、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翹、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南凉政权之所以热衷河西儒士,是因为“河西地区经两汉至魏晋,逐渐形成一批名门大姓,从前凉时起,河西大姓已成为左右时局的强大力量,河西政局常常随着这股力量的向背而发生变化。”^[31] 可见,魏晋时期的河西儒学已经对青藏地区的政治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整体上看,魏晋以后,随着中原人口的南迁与西移,中原经学也得以在更广大的区

域传播。在这个过程中,移入新地的儒生利用当地热心儒学教育或地方政权渴求儒贤的心理,结合两汉儒学政治化、功利化的整体特征,逐步在各地形成了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地方儒学形态。特定地方儒学的成立,首先应当具有一个经史兼通、著书立说的儒士群体,其中不乏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儒。其次,地方儒学受到地方势力的支持而得以推行,且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最后,地方儒学形态的形成不需要一个长时段的孕育、形成和传播过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蓬勃发展,儒学已深深扎根于河西地区。在地方政权、世家大族及外来儒生的共同影响与作用下,这一地区形成了以汉代经学为本位,提倡兼融并蓄、经世致用的具有鲜明功利主义色彩的河西儒学。如前文所述,河西儒学不仅有一批精通儒术的儒生群体,其中一些人可堪称硕儒巨士,河西儒学结合这一地区多民族、多宗教杂处共融的形势,兼采佛学、阴阳、道学之长,同时针对地方势力或政权的需要,对其学说及主张进行调适,逐步形成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儒学形态。也是从魏晋以来,河西地区曾一度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单元,这一方面使得河西儒学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使它的学术与生存样态具有更为典型的地域特征。

二、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

自松赞干布始,历代吐蕃赞普极力推行北上与东进的战略。七、八世纪,吐蕃趁吐谷浑衰微、安史之乱等时机,于龙朔三年(663年)攻灭吐谷浑。755年,唐朝内乱,“各国都向唐声援,独吐蕃取乘危态度”^[32],攻占了河西、陇右之地,今西藏、青海、甘肃及新疆、

四川、宁夏、陕西的部分地区都为吐蕃所据。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曾一度攻陷唐都长安。到8世纪下半叶,吐蕃势力达到鼎盛阶段。

河西走廊既是交通要道,又是军事要地,据有河西才能稳固吐蕃对西域的统治,故而吐蕃政权十分重视河西地区。河西之地开发较早,又是丝绸之路的中转之地,吐蕃占有河西时,这一地区已有人数众多的汉族居民,其中一些已世居此地数代,已为土著,儒学及其文化传统也在此地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此外,河西之地又是西域佛教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此地寺院、造像众多,信佛群体甚众。为巩固其在河西地区的统治,吐蕃政权一方面强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另一方面也结合当地既有的民族、人口及文化形态,不仅大力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成果,也对其统治政策做出了适当的调整。而具有相当灵活性与适应性的河西儒学也积极调整人文与政治姿态,试图在异族政权统治时期获得新的生存与发展机遇。

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首先是通过特定的儒生群体实现的。

吐蕃攻占河西、陇右之地后,曾将大量汉人掠为奴隶,有技艺者有时被重用,而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则往往授予舍人之职。唐人赵璘的《因话录》卷四《角部·谭可则条》载:“……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侯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汶江先生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得出“向吐蕃投降的,特别是吐蕃占领区域内汉人,得到‘舍人’这类小官的还比较多”^[33]的结论。河西沦陷后,当地

汉族士人为吐蕃汉书舍人的也应当不少。

以沙州为例,吐蕃攻打沙州之时,沙州城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拼死抵抗吐蕃军长达10年之久,沙州刺史周鼎试图焚城逃亡,被时任沙州都知兵马使的阎朝缢杀。贞元二年(786年),在求援无望、粮械皆尽的情形下,不得已归降吐蕃。吐蕃在沙州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当地人抵抗运动此起彼伏,吐蕃政权不得不“利用敦煌的世家大族,用以安定地方秩序。”^[34]

沙州一地世族成员在吐蕃地方政权任职的人为数不少,赵晓星女士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一文中,专列表格,考核过相关人士的生平与事迹^[35]。其中,曾任唐河西节度观察使的李大宾,就作过落蕃官。李大宾为敦煌土著世族成员,据大历十一年(776年)《唐陇西李府君功德记》载,为“兴圣皇帝(西凉李暠)十三代孙”。阴伯伦曾为唐丹州长松府左果毅都尉,吐蕃统治时期,改授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伯伦也为敦煌人士,出身名宦儒门。敦煌人王锡也曾为河西节使观察使,后做了吐蕃汉书舍人。王锡在唐代河西佛教界负有盛名,吐蕃占领河西时期,他曾随由内地到敦煌传教的大乘禅师摩诃衍研习禅宗教义,后又随其至西藏境内传授禅宗,汉地禅宗思想因此在吐蕃得以传播,且影响巨大,著有《顿悟大乘正理决》等。不过,从学术属性上看,王锡是佛学学者,并不是正统的儒士。

《国语·晋语四》曾云“事君不贰是谓臣”。在儒家君臣伦理观念中,只有“不贰之臣”才算是忠君之人,儒家大一统观念支配下的“华夷之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上述

观念。然而,沙州士人世居多民族、多宗教杂处共融之地,加之吐蕃势力的威逼,有些人不得已在吐蕃地方政权任职。当然河西士人之所以放弃名节,任职吐蕃,除了地域形势与吐蕃威权所逼之外,也与河西儒学灵活、机动的学术特性有关。

从整体上看,河西士人在当地佛教僧官体系中职位较高,“在敦煌地区,汉人可以担任地方佛教界的最高长官都僧统或都教授”^[36]。然而在行政、军事体系中,落蕃官的品阶普遍偏低。不过,这些落蕃官及任职佛教界的汉人在缓和当地民族矛盾、稳定地方秩序及保存河西文脉等方面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任职吐蕃的汉人落蕃官曾一度背叛故国,身着蕃服,身份甚为尴尬。但他们时时怀念大唐,心系中原,在吐蕃统治河西近70年后,利用吐蕃内部分裂、统治衰微的机遇,领导民众起义造反,其中,瓜、沙二州归义军的领导主力就是世居敦煌的土族。

其次,从敦煌藏经洞出土古藏文文献看,一些儒学经典已翻译为藏文,其中,儒家化的史学思想及其体例对吐蕃产生了一定影响。河西儒士还以援儒入佛的形式,把儒学思想纳入佛学经典,进而影响吐蕃族的伦理观念。

经过攻城掠地,吐蕃曾盛极一时。在文化上,吐蕃在东进与北上的过程中,一方面与唐朝展开激烈的争战,另一方面又努力学习中原文化。此外,“从松赞干布时开始,征服统一各部落邦国和西藏境外的很多民族、国家,建立起庞大的王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急需巩固统治,安定社会。但被征服者总不会那么顺从,叛乱之事时常发生,危及吐蕃的安全。在这种情势下,急需能够说服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在现实阶级统治、民族统治基础上和平相处的精神武器。而当时中央专制帝国唐朝的精神武器儒学,因为具有强大的和合精神、兼容能力与温文尔雅的作风,正是吐蕃统治者急需的精神武器(佛教是另一种更适合它的精神武器)。”^[37]8世纪以来,吐蕃与唐朝的战事一般发生在唐朝西部边境,频繁战争也不允许吐蕃、唐朝之间在这一地区展开文化交流,而在吐蕃已经占有且唐朝的势力暂时无法延及的河西地区,因在之前已有深厚的汉文化积淀,世家大族云集,故而成为吐蕃学习汉文化、吸收儒家伦理思想的优选区域。正是出于以上动因和时代机缘,河西儒学对吐蕃社会与政治诸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藏文文献看,吐蕃政权着力翻译介绍的是汉地史学类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列为儒学《五经》之首的《尚书》,从P. t. 986《尚书》残本看,包括《泰誓中篇》到《武成篇》共157行,主要是译自《古文尚书》。据王尧先生对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巴黎等处的敦煌汉文本写卷《尚书》的比较研究得知,藏译为当时敦煌流行的《古文尚书》,同时参照了《孔传》、《孔疏》、《史记》等书。现存残本的主要内容如下:

- A、《尚书》之《泰誓中》,第1至28行。
- B、《尚书》之《泰誓下》,第29至67行。
- C、《尚书》之《牧誓》,第68至89行。
- D、《尚书》之《武成》,第90至157行。

古藏文《尚书》可能有全本,因为年代久远,期间又战乱不断,具体情形已无法确知^[38]。

《尚书》有《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两

种,秦时焚书,曾一度使战国籀文《尚书》失传。西汉时,伏生口述《尚书》,得28篇,即《今文尚书》。后从孔壁中出土战国文字写成的《古文尚书》与东晋梅赜所献伪《尚书》合编,形成《古文尚书》,其中多出《今文尚书》的部分一般认为其篇名或可真实,但其内容基本为杜撰。《尚书》本为上古之书,保留了夏、商、周三代的一些诰命、文书,是研究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后来,儒家将《尚书》纳入儒学经典体系,并对其进行儒学化的改造,使之成为反映和体现儒家思想的史学典籍。两汉学术界有今古文之争,不同学派的学者所依据的经典及其解释策略各不相同,王莽篡汉以来,古文经学得以大兴,以古文经学著称于世的学者甚多,有些世家大族也以古文经学为其家学。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一般形成于东汉,兴盛于魏晋,以复古、尊经为本位的古文经及其经典体系自然也受到这些家族的青睐,而从吐蕃翻译的《古文尚书》等经典来看,显然是受到了河西儒学经学取向的影响。

除《古文尚书》外,被译为古藏文的汉地史书还有:P. t. 1291《春秋后语》(即《战国策》)残本,现存有《田需贵于魏王》、《华军之战》、《秦魏为与国》、《王假之年》、《秦王使人谓安陵王》、《魏攻管而不下》等篇,其内容类似于《春秋后语·魏语》的相关部分。

尽管存世的古藏文汉地史书种类并不多,篇章也并不完整,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时河西地区的儒生们研读经典、探讨历史、讲授历史知识的传统显然对当时的吐蕃产生了直接且很重要的影响。以历史知识丰富自身的智慧,并以历史资源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是

儒学及其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之一,而吐蕃人在学习汉地史学知识及其观念的过程,促进了他们对历史知识的重视,进而形成了吻合自身文化特质的著史传统。如,吐蕃史官书写的《大事记年》,就是以世系纪年和大事记为主的史学指南,其目的是要为政府提供颁布诏令、募集士兵、政治决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情况。

以多神崇拜为本位的苯教,是吐蕃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自印度及汉地佛教传入后,深受历代赞普为代表的贵族阶层的崇奉,苯教在吐蕃的势力呈衰微之势。为挽救苯教颓势,增强苯教教义对民众的吸引力,苯教将孔子尊奉为“神变王”。据说,“神变王”拥有无穷法力,敦煌吐蕃文献中就有“孔子神变王”降伏、护持的卜辞。敦煌古藏文文献 P. t. 992、1284, S. t. 724《孔丘项囊相问书》,也是吐蕃译自汉文文献的传说故事。此外,敦煌古藏文译汉地儒家作品还有古藏文音译本《千字文》(P. t. 1046, ch. 86.) 和《杂抄》(P. t. 1238) 等^[39]。上述藏译典籍或文献要么本身即是儒家经典,要么透露着浓郁的儒学色彩,这些古藏文译本的汉文原本大多流传于河西地区,也是河西儒生习学和传播儒学思想的文献依据中的一部分。

最后,河西儒生还以援儒入佛的形式,将儒家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孝道思想融入壁画、佛经中,对当时的吐蕃人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敦煌莫高窟第 365、321、31、258、112 等窟中,有吐蕃统治沙州时期的壁画《报父母恩重经变》19 幅,其中序品 5 幅、孝养品 5 幅、恶友品 4 幅、论议品 3 幅、亲近品 2 幅。

其中,第 365 窟既有报恩经变画,又有吐蕃时期的藏文题记“圣神赞普弃宿隶赞之世……宏德(广被)垂念众生……(洪巩)……复此佛殿于水鼠年之春(或夏)兴建……才虎年仲秋月开光承礼,塔塔、索晟供敬祈祷。”^[40]《报恩经》大致形成于五、六世纪之间,吐蕃统治时期《报恩经》变画出现于敦煌莫高窟,“可能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吐蕃统治者和吐蕃人接受了儒学的忠孝观,认为是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的重要因素。”^[41]此外,敦煌古藏文文献中保留了一些译自汉文的《无常经之解说》、《不分善、杀生、饮酒经之解说》、《恶行经之解说》、《孝子经之解说》、《善行经之解说》等佛经变文。这些佛经变文的汉地原本具有典型的援儒入佛的思想特征,同时又具有敦煌变文的文法风格,是研究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文献。

吐蕃统治者还对河西地区的儒化风气甚是羡慕,敦煌文献 P. 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中说,敦煌地区“人驯俭约,风俗儒流……惟忠孝而两全,兼文武而双美。”P. 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工德记》称阴处士“人烽孝悌,出整纲宗。”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寺学较为发达,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私人文书,如题于北冈 84 号《观音纪》卷末,文云“辛丑年七月二十八日,学生童子唐文英为妹久患写,毕功记”; P. 362《封常清谢死表闻讽谏今上·无名歌》题记“末年三月十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来看,寺学学生中也有部分当地的汉族人。东晋末年以来,汉地佛教放弃了沙门不敬王者、僧俗无涉等主张,充分吸收了儒家忠孝思想,到唐代时基本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转型。吐蕃政权试

图以佛教教育管束百姓,针对河西地区汉族人口居多的实际情形,允许寺学讲授儒家经典,寺学学生学习的内容除佛教《经》、《律》、《论》三学为主要内容外,也包括“许多传统的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左传》、《谷梁传》、《尚书》、《礼记》以及宣传儒家思想的童蒙读物《太公家教》、《开蒙要训》等。”^[42]

敦煌藏经洞还出了两部内容基本相同、可以互相补充的古藏文经卷(P. t. 1283、P. t. 2111) 经卷以兄弟二人问答的形式,阐述了处理人际关系、看待社会问题等方面的认识和见解。王尧、陈践两位先生曾对这两部经卷进行了全文译注,并命名为《礼仪问答写卷》,并断定它是八、九世纪之作^[43]。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集中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对吐蕃民族的影响,这一写卷所阐述的孝敬父母、兄弟友爱、为人仁厚等思想,与儒家仁、义、礼、智、信即“五行”理念如出一辙。当然,《礼仪问答写卷》并不一定是受河西儒学影响而形成的古藏文文献,但它出土敦煌的事实至少说明这一集中反映吐蕃民族借鉴、吸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文献与河西地区关系密切。

综上,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后进民族吸收、学习中原文化的内容,也有异族政权在河西发展和锻造统治基础的因素,还有地方儒生借自身文化优势参与政治,以求得生存机遇的成分。总之,河西儒学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分支,因其生成于多民族杂居且属于军事、交通之要地的河西地区,故而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河西儒学对吐蕃的影响,既是以儒学为纽带的民族文化交流、互融的典型

史实,也是河西儒学辐射和影响青藏地区的典型实例。

[参考文献]

- [1]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邵如林. “河西文化”论[J]. 西北史地, 1995, (2).
- [3]马志强 吴少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西儒学略论[J]. 洛阳大学学报, 2004 (3).
- [4]张步和. 试论五凉的三个儒学中心[J]. 社科纵横, 1992 (5).
- [5]陈炳应. 从敦煌资料看儒学对吐蕃的深刻影响[J]. 敦煌研究, 2004 (4).
- [6]赵晓星.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J]. 中国藏学, 2003 (2).
- [7]韩锋. 儒学在吐蕃的传播及其影响[J]. 齐鲁学刊, 2007 (3).
- [8]韩锋. 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J]. 中国藏学, 2010 (1).
- [9]〔东汉〕班固. 汉书·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644 - 1645.
- [10]〔西汉〕司马迁. 史记·平准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425.
- [11]〔东汉〕班固. 汉书·刘屈氂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882.
- [12]〔东汉〕班固. 汉书·昭帝纪[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21.
- [13]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154.
- [14]〔唐〕房玄龄,等. 晋书·索靖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436.
- [15]〔唐〕房玄龄,等. 晋书·段灼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303.
- [16]〔唐〕房玄龄,等. 晋书·张轨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03.

- [17] 见 [16]: 1503.
 [18] 见 [16]: 1503.
 [19] 见 [16]: 1504.
 [20] [(北齐) 魏收. 魏书·术艺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394.
 [21] 见 [13]: 422 ~ 424.
 [22] [(北齐) 魏收. 魏书·胡叟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301.
 [23] [(唐) 令狐德芬. 周书·庾信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650.
 [24]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元嘉十六年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1101.
 [25] [(北齐) 魏收. 魏书·赵柔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303.
 [26] 见 [25]: 2303.
 [27] 见 [25]: 2303.
 [28] [(唐) 房玄龄, 等. 晋书·凉武昭王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508.
 [29]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绪论” 第 2 页.
 [30] 见 [3].
 [31] 崔永红, 张得祖, 杜常顺. 青海通史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96.
 [32] 岑仲勉. 隋唐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275.
 [33] 汶江. 吐蕃统治下的汉人 [J]. 西藏研究, 1982, (3). [34] 见 [6].
 [35] 见 [6].
 [36] 见 [6].
 [37] 见 [5].
 [38] 王尧. 西藏文史探微集 [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29 - 30.
 [39] 荣新江. 敦煌学十八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33.
 [40] 黄文焕. 跋敦煌 365 窟藏文题记 [J]. 文物, 1980 (7).
 [41] 见 [5].
 [42] 见 [7].
 [43] 王尧, 陈践. 敦煌古藏文《礼仪问答写卷》详解 [J]. 西北史地, 1983 (2).

The Impact of HeXi's Confucianism on Tibet

LI Jian - 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710062 China)

Keywords: Hexi's Confucianism; Tibet; Hexi area

Abstract: Hexi's Confucianism was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Han traditional classical academic theory which advocated financial and useful idea. Its academic and living status was quite flexible. It began from the Han Dynasty, was formed in the Wei and Jin, and influenced the politics, education, ethics, etc of Tibet at that time. The impact of Hexi's Confucianism on Tibet was not only the typical historical fact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ut also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radiation effects of Confucian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n the Qinghai and Tibetan region.

[责任编辑: 孙伶伶]

[责任校对: 格 珍]